本院「築城風雲：清代文獻與圖像中的臺灣諸城」所展出的院藏城瓦　作者攝

築城也築史——
院藏臺南城瓦的故事

蘇峯楠

六件斑駁的紅瓦片，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文物庫房裡，靜靜躺了超過半世紀。它們來自何方？爲何會出現在本院？院內登錄品名只有「殘瓦」寥寥二字，其它紀錄不多，身世緣起彷若成謎。然而，它們表面都有「城瓦」兩個大字，隱約透露了與某座城有關。

其實，它們是臺灣最大的城牆都市（walled city）：臺灣府城（今臺南）的遺存構件。雖然外表陳舊不起眼，但藏在背後的，有一座城池建立的故事，有近現代臺南城市街廓的變化痕跡，更有人們寄託在文物上的歷史記憶。

臺灣最大的城牆都市

現在臺南市中西、北、東區一帶，原本是南島語系（Austronesian）西拉雅社群人們的生活領域。至少在十六世紀後期，來自中國、日本等地的漁民、商人、海盜等東亞海域各方人群，就已在該地頻繁進出；1625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更建立堡壘、規劃市鎮。此後，該地成爲歷來統治者重要據點，政經中心的地位也逐漸確立。

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入主臺灣，成立一府三縣，該地持續作爲行政中心，大小官署座落其中，有「郡治」或「郡城」的雅稱，也因此很早就開始討論建城之事。1680 年代，臺灣鎮總兵已向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提出建城之議；1700 年代晚期，福建巡撫張伯行（1651-1725）定調興建刺竹城，命地方官府回報預定植竹的位置、面積、數量等細節；1711 年（康熙五十年）更有興建石城之議，但實際勘估後，因所費工力龐大，缺乏充足經費支持，仍告中止。[1]

1721 年（康熙六十年），朱一貴（1690-1722）、杜君英（1667-1721）率眾起事抗官，郡治遭攻佔，直接暴露了無城可守的問題。1722 年（康熙六十一年），福建水師提督姚堂（?-1723）再奏請建城，但朱一貴事件讓康熙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對臺灣建城的態度更趨保守；即使如此，建城計畫還是在地方持續討論。[2]

雍正帝（1678-1735，1722-1735 在位）繼位後，情況有所翻轉。1723 年（雍正元年），建城計畫應已起步；1724 年（雍正二年），巡臺御史丁士一（1665-1732）、臺灣鎮總兵林亮（1664-1727）等人仍密切開會討論。[3] 到了 1725 年（雍正三年）終於規劃完成，在巡臺御史禪濟布（生卒年不詳）該年春天的奏摺裡，可見「樹以木柵，其基三面環山」、「每隔肆拾丈蓋小望樓壹座，上安砲壹位，撥兵支守」、「於要衝之處開闢四門〔按：最後實際開 7 座城門〕，各築高大門樓壹座，安設砲位」等不少具體施工細節，並擇定 1725 年 5 月 9 日（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七日）開工。這個木柵城方案，是以郡治所在的濱海沙質地勢來規劃，並節省不少經費，讓雍正帝在硃批中表示「籌畫甚屬妥當，深爲可嘉」，給予正面肯定（圖 1）。

此後百餘年間，隨著住民人數增加、街廓擴張、外力侵襲與災變等，府城進行多次修補改建。較主要的幾次，包含 1734 ～ 1736 年間（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元年）木柵牆增種刺竹，城門改石砌；1759 年（乾隆二十四年）圍牆再增種綠珊瑚（圖 2）；蔣元樞（1738-1781）在 1775 ～ 1778 年（乾隆四十至四十三年）任職臺灣府知府期間，主持重建木柵牆，補強刺竹、綠珊瑚、林投樹之種植，並增建小西門，城門達 8 座（圖 3）；1788 ～ 1791 年（乾隆五十三至五十六年）間，全面改建爲三合土城牆；1805 年（嘉慶十年）因應海盜蔡牽（1761-1809）集團來襲，西門外添建木柵外城；1833 ～ 1836 年間（道光十三至十六年）再度全面重修，包含重建西門、東門的外城，城門數量高達 14 座；1862 年（同治元年）嘉南大地震造成城牆毀損，展開重修；1874 年（同治十三年）城牆又因暴雨大幅坍塌而再度重修等。每一次修建，都是住民對於不同時空課題的肆應，城市的輪廓與格局也連帶有所變化。

城池解體，城瓦現身

1895 年臺灣進入日本統治時期，帝國統治者開啓近代都市規劃，府城城牆與城門失去了原有防禦及政治象徵功能，陸續遭到移除。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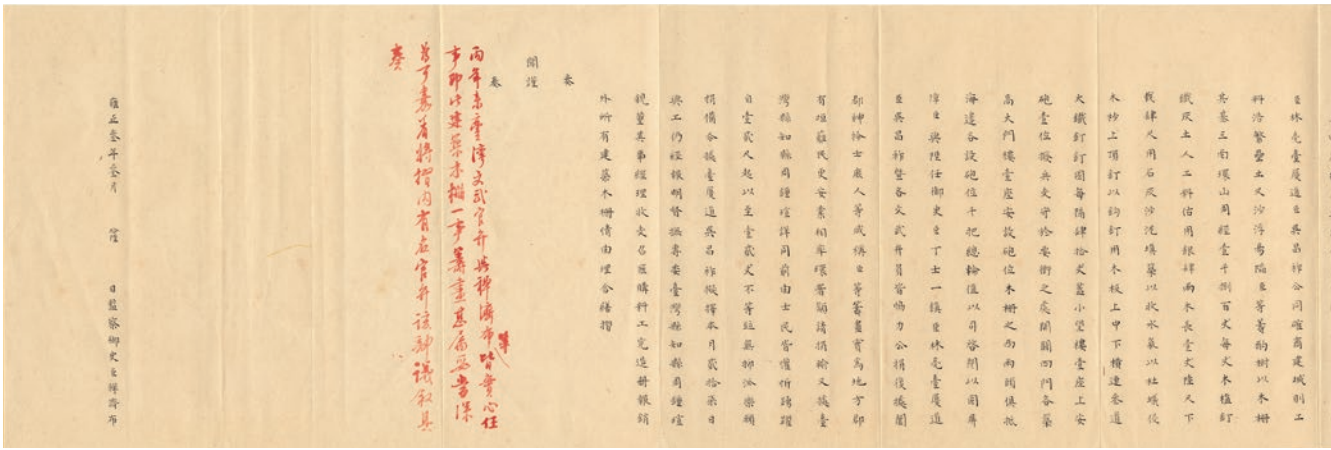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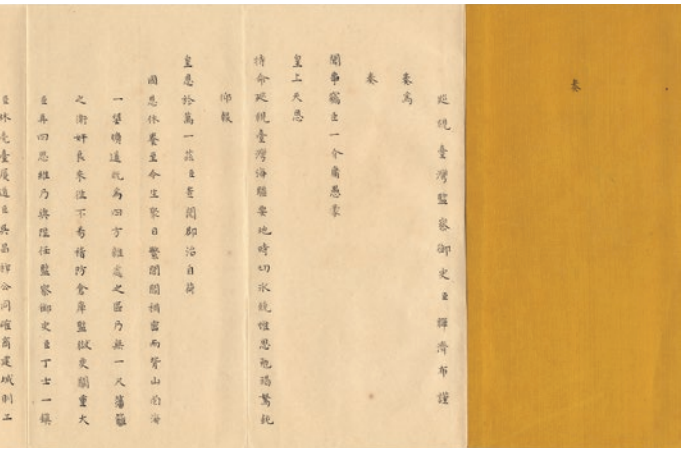


圖 1　清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禪濟布　〈奏報臺灣府城建築木柵情形〉　清雍正 3 年 3 月 16 日（1725 年 4 月 28 日）　10 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1213

圖 2　18 世紀中期　臺灣地圖　卷　局部　臺灣府城一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795
圖中大致呈現 18 世紀中期府城有 7 座城門，並搭配木柵牆、種刺竹的形勢。



先是 1904 年拆除的大西門，[4] 此後各城門也漸次消失，如大北門、小北門於 1911 年拆解，構件充作新築日軍臺灣步兵第二聯隊永久兵營（今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建材；小南門則可能因年久失修而自行塌毀。[5]

最後留下的主城門，僅剩大南門、大東門、小西門3座。在1929年的臺南市區擴張計畫裡，它們都以公園、圓環等綠園規劃特別加以保留；1935 年更以「臺南城門」之名，受臺灣總督府指定爲「臺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6] 其中，

圖 3　1770 年代晚期　蔣元樞　重建臺灣郡城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71

左圖 4　20 世紀前期　1930 年代整修完成的大南門公園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2001.008.0420　取自該館典藏網：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1.008.0420（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
右圖 5　1944 年　臺南私立和敬女學校師生合照於大東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2014.010.0089.0023　取自該館典藏網：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14.010.0089.0023（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

大南門早在 1927 年就展開修復工作，周邊亦闢爲公園，1930 年大致整建完成後，成爲臺南知名休憩景點（圖 4）。大東門亦有圓環規劃，同樣是具有濃厚臺南意象，能吸引民眾走訪與攝影取景的景點（圖 5）。

在城池解體的過程中，舊件脫落而散佚各處，有的移轉他處，再次利用；有的廢棄不存，消失在歷史洪流中；有的則被人們拾起，受到珍視保存。大約 1930 年代起，就有一種名爲「城瓦」的物件，開始現身於臺南當地的博物館。其中之一，就是以自然史爲主軸的「臺南州教育博物館」（以下簡稱「教育館」）。

教育館座落在十九世紀晚期兩廣地區人士在府城的同鄉辦事處「兩廣會館」（圖 6，現已不存，位置在今臺南市美術館一館後方），前身爲 1902 年成立的「臺南博物館」，是很早開始運作的公共博物館。[7] 1935 年，臺灣總督府舉辦盛大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以下簡稱「臺博會」），向世界展示對臺統治及建設成果，其中有一座地方主題館位於臺南，是結合歷史古都特色來規劃的「特設臺灣歷史館」。根據《臺灣歷史館出品目錄》所列文物清單，教育館當時提供了其蒐藏的大南門「城瓦」、「城巴」（原文即如此；疑爲「城石」之誤）、「煉瓦」（紅磚）、「城樓窗格」，以及大東門「瓦」、「城巴」各一件，共 6 件文物參展。[8] 由此可知，教育館有典藏大東門、大南門舊構件，當中包含一件大南門的「城瓦」。之所以會有大南門的物件，筆者推測可能是來自 1927 至 1930 年間大南門重修時卸下的舊材。至於大東門也有一件「瓦」，雖然不知是「城瓦」或一般瓦片，但也至少是府城城樓之物。

此外，特設臺灣歷史館也有徵集到「臺灣府城重建札」1 件、「建築用具」4 件、「城瓦」6 件等府城建築相關構件。[9] 它們來自何處、該館又如何取得，無記載可循，推測或許與教育館狀況類似，也是來自大南門或大東門。

臺博會結束後，特設臺灣歷史館的展示內容與文物，移交給「臺灣史料館」承接。該館位於安平舊稅務司署（圖 7，今臺南市安平區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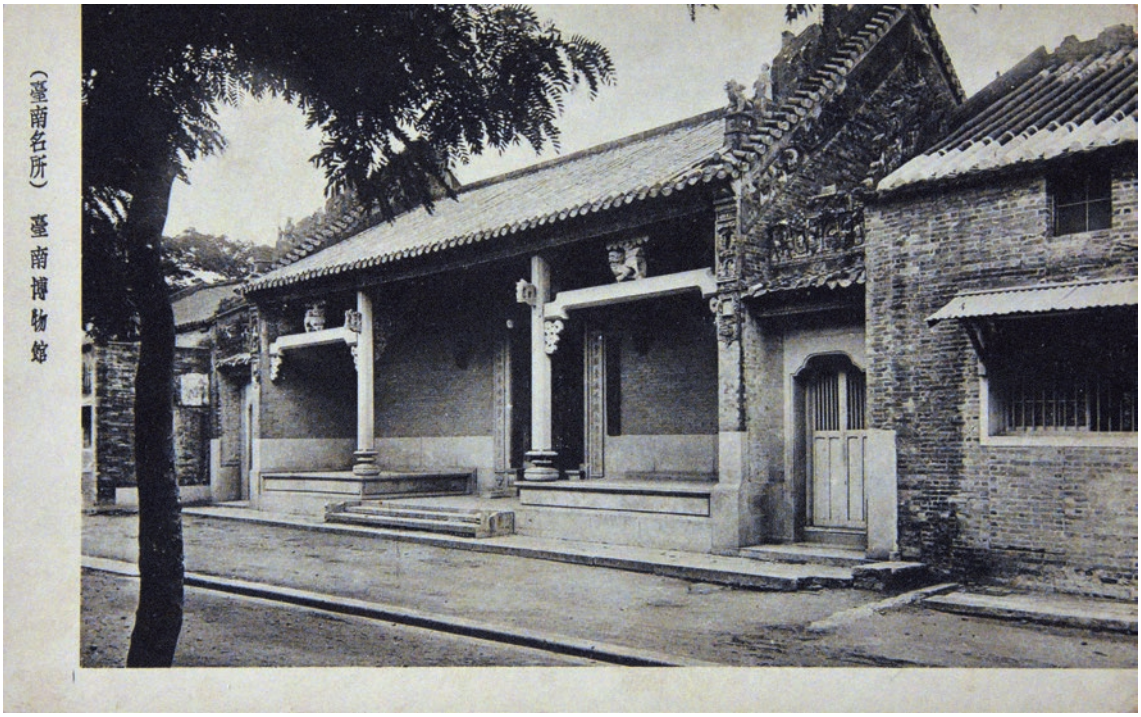


圖 6　1930 年代　臺南州教育博物館明信片　作者翻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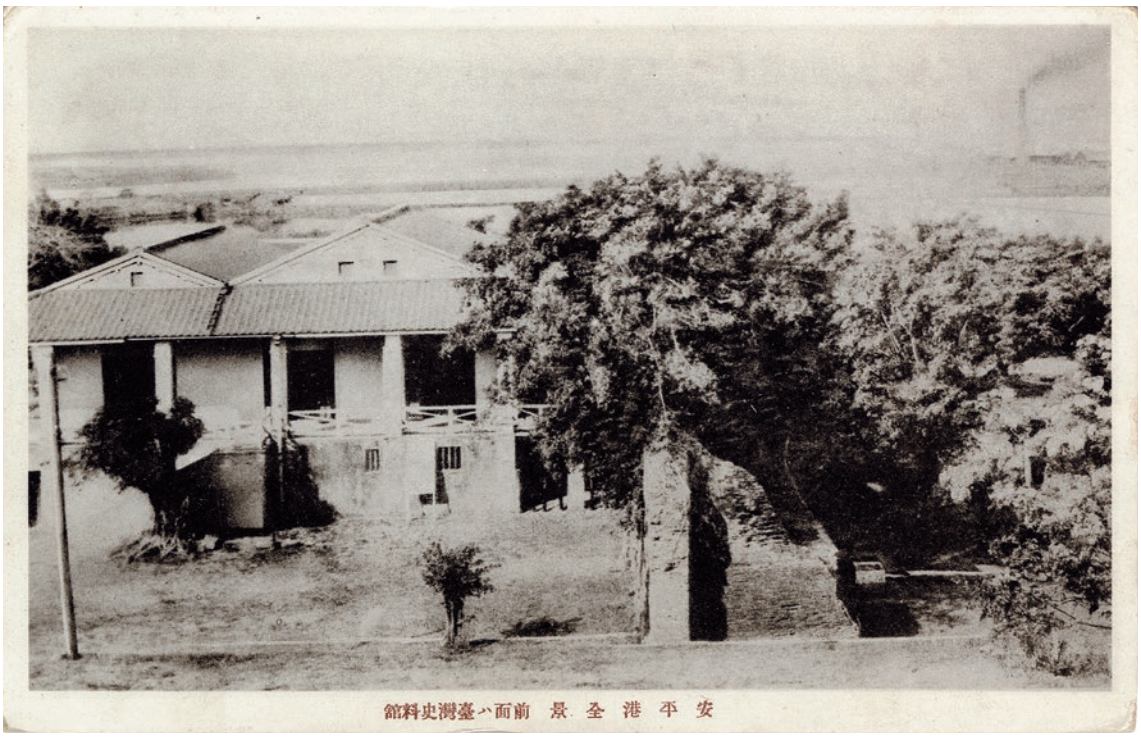


圖 7　1930 年代　安平臺灣史料館明信片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2001.008.0485　取自該館典藏網：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1.008.0485（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

蘭遮城博物館），是 1930 年臺南市役所舉辦「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結束後，以該活動「史料展覽會」的內容爲基礎而成立的，爲臺南首座以歷史爲主軸的館舍。承接了特設臺灣歷史館內容之後，該館再改爲「臺南市歷史館」（以下簡稱「歷史館」），於市區內的大正公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旁新建館舍（位置在今臺南市中西區公所），1937 年正式開館（圖 8），爲今臺南市立博物館（以下簡稱「南市博」）前身。這段過程裡，6 件城瓦應也在 1935 年由史料館承接，成爲後來歷史館的藏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特設臺灣歷史館的展示文物裡，也有臺南州內務部地方課雇員的谷田幸三（生卒年不詳）提供「城瓦」4 件，及臺南市役所土木水道課技手的連川潨（生卒年不詳）提供「臺灣府城高樓之屋根瓦」1 件。這些物件的來歷同樣是文獻不載，不過，這至少顯示當時持有城瓦的，不只教育館、歷史館等公共館舍，也有私人蒐藏者。他們會有這些舊件，可能出自對臺南地方研究的興趣及關注。以谷田幸三爲例，他除了有蒐藏文物外，1935 年也參與臺南古碑蒐集工作，更曾與臺南在地文史研究者石暘睢（1898-1964）共同在市區南郊進行史前遺物採集，並撰文發表清治時期臺南官署等掌故，可說也是臺南先行研究活動的投入者之一。[10]

這些文物採集與蒐藏行動，除了爲臺南留下歷史物證與紀錄，也反映當時人們對於地方史的關注及參與。「城瓦」的現身，就讓人們的探索行動，或者展覽會、公共博物館等公共展示場域，得以藉之整理與拼湊臺南歷史圖像。

圖 8　1930 年代　臺南市歷史館明信片　作者翻攝

躲過戰火，持續述史

臺博會落幕後，參展的城瓦，應即回歸到各自的館舍存放或展示，持續在博物館場域，與其他文物共同發揮歷史解釋與公共展示功能。日本現代主義詩人春山行夫（1902-1994）即提過他有在教育館裡看過城瓦。[11]

二次大戰末期，臺南市區於 1945 年 3 月遭美軍數次空襲。教育館、歷史館所在的大正公園一帶，因政府機關集中地而成爲重點攻擊區域，兩座館舍都難逃此劫，盡毀於戰火。但在此之前，隨著戰局日漸緊張，歷史館部分文物已移置延平郡王祠、赤崁樓等地，所以館舍雖毀，但有部分文物倖存，成爲現今南市博藏品的一部分。

至於城瓦，是否也有躲過戰火呢？答案是有的。

1948 年 10 月 20 日至 12 月 5 日，臺灣省政府主辦的「臺灣省博覽會」（以下簡稱「省博會」）於臺北市舉辦，呈現新政府三年來在臺灣的施政建設規劃，是繼 1935 年臺博會之後，另一次官辦大型臺灣展覽活動。會場主要位於省政府大廈（今總統府），在臺灣省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也有第三會場文獻館，展出臺灣歷史文物，內容由時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的楊雲萍（1906-2000）規劃。在臺南歷史館職員石暘睢協助下，部分歷史館藏品有到臺北參展，城瓦也在其中。[12]

在南市博的典藏品中，就有這麼一件城瓦（該館登錄號 20080531920000，圖 9）。根據 1955 年《臺南文化．歷史館專號》的說法，這件城瓦，以及其他兩件附有鳳凰、麒麟圖紋的瓦當（20080531919001），原本是「臺南博物館」所藏，終戰後從其故址移轉歷史館收藏；[13] 而所謂的臺南博物館，看來應指教育館。前文提到，

圖 9　18 世紀後期至 19 世紀　臺灣府城城瓦　© 臺南市立博物館提供 20080531920000

1935 年臺博會參展文物中，教育館有提供 6 件大南門、大東門構件，當中就有一件大南門城瓦。若南市博這件城瓦眞的來自教育館舊藏的話，應即大南門之物，或許也是當年春山行夫在教育館看到的城瓦，亦是 1948 年省博會期間到臺北亮相的臺南文物之一。

不過，這個說法有一些細節需要釐清，這是因爲現今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的典藏中，也有 5 件城瓦（該館編目號 AH001974-001 至 005）。根據遺留在原件上的舊標籤來看，它們最早被稱作「安平城瓦（明末時代）」，現今館方登錄名稱也採用此名。它們的形制與南市博藏件相同，其中一件有鐵絲纏繞，應是往昔吊掛展示時製作的支架（圖 10）。以此來看，它們應非安平或所謂明末之物，而是同樣來自臺南府城的城瓦。

依據臺博館典藏系統詮釋資料，這些城瓦並非臺博館前身的日治時期總督府博物館藏品，而是 1948 年 12 月 7 日才由外界捐贈入藏。臺博館 1952 年陳列品清冊也記載，歷史部有編

圖 10　18 世紀後期至 19 世紀　臺灣府城城瓦　©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　AH001974

號 1974 的城瓦一件，來源爲「臺南歷史館石暘睢先生贈」，[14] 可見臺博館所藏城瓦，是來自臺南的歷史館。從捐贈時間點來看，當時是省博會剛閉幕不久，筆者推測，讓這些城瓦在戰後初期從臺南歷史館跑到臺北臺博館的契機，可能就是省博會的參展；活動結束後，石暘睢直接將 5 件城瓦捐贈予臺博館，僅 1 件回歸臺南歷史館。若它們同爲歷史館舊藏，則應是前述 1935 年臺博會特設臺灣歷史館所徵集的那 6 件城瓦。

據此，眞正躲過戰火的，可能是二戰末期因文物移置而逃過一劫的歷史館藏 6 件城瓦。終戰後，它們繼續在公共展示場合與大家見面；而回到臺南的那件，之後也在《臺南文化》、《臺南市志》等刊物多次被提及，作爲臺南史代表文物之一。因此，南市博藏件，可能不是《臺南文化．歷史館專號》所說的「臺南博物館」舊藏；至於教育館藏的城瓦，去向不明，有可能隨著 1945 年兩廣會館的炸毀，完全消失在戰火中了。

小西門拆遷與院藏城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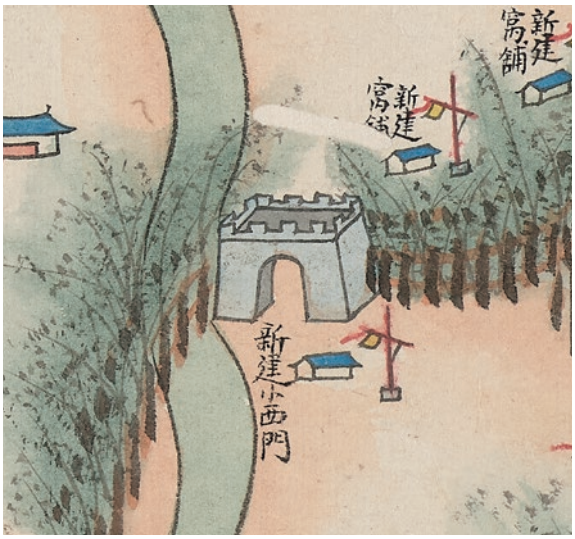
除了南市博、臺博館的城瓦外，1960 年代晚期又有另一批臺南城瓦現身。它們與小西門的拆遷有直接關聯。

小西門是府城西南方的城門，原址在今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702 巷口南側。長久以來，居民慣稱附近一帶爲「小西腳」（sió-sai-kha），此即因小西門得名。如前所述，小西門是 1770 年代晚期知府蔣元樞主持府城重修工程中新建的城門（圖 11），讓全城在東、西、南、北四方各有大、小兩門，首度達到 8 座城門的基本格局。日治時期，它與大南門、大東門共同以臺南城門史蹟之名原地保留，市區改正計畫也搭配規劃綠園，小西門周邊即預定開闢一個橢圓形的大型圓環（圖 12）。如果完成，它將是市區佔地最廣的圓環。

此後，小西門圓環雖然一度完成東北角的闢建，卻隨即進入二戰末期，計畫不及完成，統治者就再度易主。終戰後，臺南市政府承接了日治時期都市計畫，惟缺乏經費，無法接續

闢建；直到 1965 年配合臺灣省政府工程局拓寬逢甲路（今西門路一段），始初擬「臺南古蹟小西門城整理計劃」，預定順勢整頓城門周邊違建，並編列經費整修城門。

然而，1966 年臺南市議會卻認爲小西門「有礙市容觀瞻，且對交通妨害至鉅」，請市府「從速先予拆除」。時任臺灣省立成功大學（今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校長羅雲平（1915-1984）聞訊後出面爭取，於 1967 年函致市府「如勢在必拆，本校歡迎遷建至本校光復校區古城牆旁，藉以保存古蹟」，此方針即在該年 9 月於市務會議中通過。[15] 1969 年，小西門動工拆卸，成爲最後一座被移除的府城城門；緊接著，它再到兩公里遠、當時成大剛從軍方購得的光復校區內府城東城牆殘跡上重新組建，1970 年 3 月竣工（圖 13、14）。



左圖 11　1770 年代晚期　蔣元樞　重建臺灣郡城圖　局部　小西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71
右圖 12　1936 年　橋本壽一編、橋本紙店發行　六千分一臺南市地圖　局部　小西門附近計畫道路及圓環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2004.028.3121.0001
取自該館典藏網：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3121.0001（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

圖 13　20 世紀後期　位於原址的臺灣府城小西門原貌　© 臺南市立博物館提供　20180540442000

圖 14　遷建成大光復校區的臺灣府城小西門今貌　作者攝

圖 15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藏城瓦概況　作者攝

圖 16　18 世紀後期至 19 世紀　臺灣府城小西門城瓦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藏　作者攝
左上角可見以鉛筆書寫「68」的淡淡筆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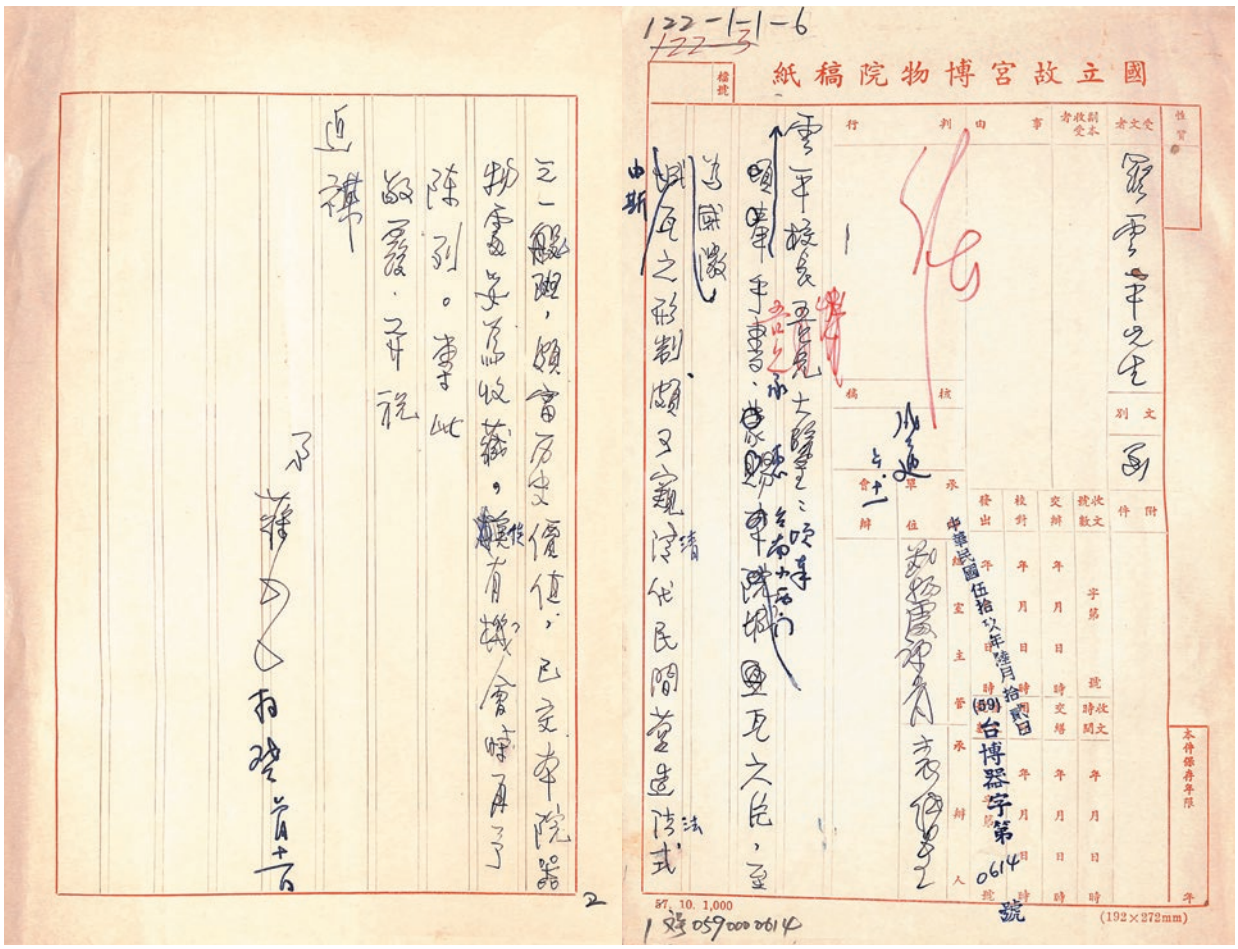


圖 17　1970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復羅雲平函稿　©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國立故宮博物院 0059/122/1/0001　作者翻攝

重組後的小西門，與原貌不盡相同，原建材也沒有全部組裝回去。像是屋頂的部分，應是以新瓦替換，舊瓦片卸下後另作收存，其中有一大批交給當時甫成立不久的歷史學系（1969年奉教育部核准成立；以下簡稱「成大歷史系」），可說是該系最早的收藏之一。

如今，這批城瓦仍收存在該系。經筆者檢視，整體數量包含完整、碎裂或殘缺者，至少有36件（圖15）。它們件件斑駁，但表面上的「城瓦」字跡仍清晰可辨，有些更留有遷建當時的痕跡，如有些舊報紙碎片殘存其上，應是拆卸後所用的包覆材。此外，遷建當時到底有多少這類城瓦被卸下，目前不清楚；但在這批城瓦裡，有些表面留有鉛筆劃寫阿拉伯數字的痕跡，最大有寫到68者（圖16），筆者認爲可能是統計編號。若是如此，當時卸下的瓦片應至少在68件以上。

另外，還有一些城瓦，是受校方捐贈校外其他館所。1970年，有4件城瓦由成大捐贈給臺北市南海路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即今館方典藏的「臺南城瓦」4件（該館登錄號29885至29888）。[16]另有6件城瓦捐贈給本院，爲本院1965年於臺北市外雙溪開館後，較早獲民間捐贈入藏的文物之一。依據1970年6月12日本院復羅雲平函稿所述，羅雲平最初應是隨函將「臺南小西門城瓦六片」送交本院，而本院復以：「由斯瓦之形制，頗可窺清代民間營造法式之一斑，頗富歷史價值，已交本院器物處妥爲收藏，俟有機會時再予陳列」，意即基於這些城瓦具有清代民間物件歷史價值的認識上，同意它們入藏本院（圖17）。

此外，在南市博，除了前面提到一件日治時期歷史館舊藏城瓦之外，也有另一批共3筆19件的屋瓦構件藏品，包含登錄品名爲「小西門城雨簾（滴水）」共7件（該館登錄號20080531090001至007，內含滴水1件〔圖18〕、瓦片6件）、「小西門瓦筒（瓦當）」共2件（20080531091000，圖19）、「小西門城城瓦」共10件（20080531092001至005）等。就形式來說，它們總共有瓦片16件、筒瓦1件、瓦當1件、滴水1件；瓦片的部分，大多皆有「城瓦」二字，惟「小西門城雨簾（滴水）」裡的5件

圖18　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　臺灣府城小西門滴水　© 臺南市立博物館提供　20080531090004

圖19　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　臺灣府城小西門瓦當、筒瓦　© 臺南市立博物館提供　20080531091000

瓦片爲素面，無任何文字（圖 20）。由於 1955 年《臺南文化．歷史館專號》沒有提到這批物件，應是之後才入藏該館；而從其品名都明確標示「小西門」來看，它們也很可能是在小西門拆遷後，由成大捐贈的屋瓦構件。

當時從小西門卸下的城瓦數量不少，羅雲平或成大得以取用，與校外館所建立交流關係。1956 年臺灣省立工學院改制爲成大後，先有中文系；後在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推行後中學師資培育需求增加的背景下，再成立歷史系。[17] 這些透過文物捐贈與博物館互動的成果，很大一部分應直接回饋到當時初創的成大歷史系，成爲其往後培養網絡、持續交流的對象，如本院前院長蔣復璁（1898-1990）曾至該系文物館參訪；1974 年，該系亦與國立歷史博物館簽署古物研究合作協約。[18] 前面提到省博會結束後歷史館石暘睢轉贈 5 件城瓦給臺博館，推測可能也是類似的交流關係。在這過程中，城瓦不只是古物，更像是用以交流往來、搭建關係的一種「禮物」。

圖 20　18 世紀後期至 19 世紀　臺灣府城小西門城瓦　© 臺南市立博物館提供　20080531090001

圖 21　18 世紀後期至 19 世紀　臺灣府城小西門城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008

細覽城瓦

那麼，所謂的「城瓦」，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物件呢？以本院所藏 6 件，以及其他館舍典藏的原件來看，它是一種未上釉的素燒紅瓦片，外型略帶弧度。其縱向尺寸多在 23 至 24 公分間；橫向略寬一點，多在 25 至 26 公分間；厚度大約 1 公分左右。由於是從城門卸下、已使用過的構件，所以表面上多有殘留白灰黏著痕跡，以及長久覆蓋所產生深淺不一的色差。而最顯眼的，莫過於正中央的「城 瓦」二大字（圖 21）。

這類薄形瓦片，是漢人傳統建築屋頂上常見的鋪設材「板瓦」，用以承接並排洩雨水。安裝時，兩面皆可置放，凹面朝上者稱「仰瓦」，朝下者稱「俯瓦」（圖 22）。鋪設時主要採用仰瓦，讓凹面作爲排水凹槽；而每排仰瓦之間，一般建築常會再覆以一排俯瓦；若是官署、祠堂、寺廟等正式建築，則是鋪一排半圓形筒瓦，末端屋簷處再以瓦當、滴水等構件收尾。臺灣府城城門的門樓屋頂即爲此種作法（圖 23），前述南市博所藏小西門筒瓦、瓦當、滴水等（見圖 18、19）即爲相關構件。

圖 22　18 世紀後期至 19 世紀　臺灣府城小西門城瓦　仰瓦（左）、俯瓦（右）置放方式示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005

圖 23　臺灣府城小西門屋頂的筒板瓦鋪設形式　作者攝

瓦片的排列方式，常見將每一片左右對齊，以適當間隔作縱向排列；但也會有稱作「蜈蚣腳」的方式，一片偏左、一片偏右交錯排列，以擴大水槽面積，提高防漏水效果。[19] 在這些城瓦的表面，都可見遺留偏左、偏右的疊合色差痕跡，可知其原本皆作「蜈蚣腳」排法。

這類城瓦是何時之物？製作緣由又是什麼？雖文獻乏載，但從小西門也有使用的情況來看，至少可確定是 1770 年代小西門創建後才有的產物。至於南市博的歷史館舊藏城瓦（見圖 9），外表與小西門相同，也顯示它不只用於小西門，應是某次全城整修所用之物。

另一方面，臺灣氣候高溫多雨，前面也提到十九世紀府城一些大規模重修都與地震、颱風有關，所以在屋頂上承受風吹雨打的瓦片，應該很難從十八世紀後期就一直使用而沒替換過。成大捐贈南市博的瓦片即顯示，小西門的瓦片並非全是鈐字款，也有表面看來與一般瓦片無異的素面瓦片（見圖 20），說明城樓屋頂上存在著不同種類瓦片，應是不同時間、批次的整修結果。因此，這類鈐字城瓦可確定是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期間之物，惟來歷有幾種可能：推測最早是 1770 年代蔣元樞重修全城所用，之後雖經歷幾次修補，仍有一部分留在城上；或者，也有可能是後來某次重修全城時製作之物，用以替換部分早先舊材。

至於瓦片上的「城瓦」字跡，也值得觀察。二字爲楷體，直行，字體淺凹，多出現在瓦片

左圖 24　臺北府城留有「老紅」、「大山」等字樣的砲臺基石　作者攝
右圖 25　1893 年　「光緒十九年新竹縣造」款紅磚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2020.006.1313　取自該館典藏網：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mo=2020.006.1313（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4 年 12 月 31 日。

凸面正中央處，也有一些往旁邊偏移（如圖9）。每件瓦片字體都相同；而從南市博的歷史館舊藏城瓦以及小西門城瓦來看，不同時期獲得的城瓦，一樣都有此二字。所以，此二字不是瓦片卸下後才後期加工鐫刻，而是工匠一開始就以手工將印模逐件鈐蓋在黏土胎體上，送燒製後，成爲帶有「城瓦」二字的特製瓦片。

一般而言，瓦片及其他傳統建材附有文字或符號者相對少見，若費工施加，應有特定理由。彰化鹿港龍山寺正殿的十九世紀薄瓦，即鈐有「泉城阮協興號」方印，一般認爲是加蓋商號印信以強調品質保證。[20] 建於 1880 年代的臺北府城，部分石材有書寫「老紅」、「大山」、「城工」等字跡（圖 24），似與建材的來源或使用管理有關。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亦典藏一件側邊有「光緒十九年〔1893 年〕新竹縣造」字樣之紅磚（圖 25），也屬於官府特別定製附有款識者。這些被施加文字的料材，雖各有緣由，但應該都是要標誌或傳達某種訊息。

臺南府城所用瓦片上的「城瓦」二字，不是商號或人名，重點似乎在表述使用的對象或事由。或許可猜想：此二字是否類似一種標明身分的「戳記」，避免這批官府定製之物與他件混雜，或被移作他用？文獻失載的狀況下，此二字的緣由仍難以確認，只能待來日考索；不過，這也足以提醒我們，維護一座城池並不簡單，背後可能還有更多故事，甚至意想不到的課題／難題。

結語：臺南城瓦的社會生命史

府城的城瓦，既源自十七世紀末臺南與帝國相遇的歷史轉折，也是臺灣最大城牆都市的發展足跡，更是二十世紀都市近代化改造下臺南面臨巨大變化的見證。隨著城牆與城門漸次消失，城瓦脫離其原棲之處，但有一些城瓦走進蒐藏家、博物館、博覽會的領域，在典藏與展示關係裡，與人們一同記憶臺南過往；更在徵集、借展及捐贈過程中，成爲各方交流互動、建立關係的物件。就在這樣的因緣下，6 片城瓦才從臺南小西門出發，歷經幾轉，最後千里迢迢跑到臺北，落腳至本院。

由此來看，城瓦也許始終沒有失去其「構築」的功能。往昔，它築起城池；城池消失後，它轉而爲衆人築起城市的公共歷史記憶，可說是先築「城」、亦築「史」。

回顧它們這段故事，映現在我們眼前的，不再只是靜態陳舊、紀錄不多的「殘瓦」，而是充滿連結與轉折的物件社會生命史（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及其背後的近現代城市史縮影。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清）季麒光撰、李祖基點校，《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頁 178-179；（清）張伯行，《正誼堂文集附續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第 2483 冊，卷 5，〈檄文〉，頁 56；（清）王必昌總輯，《重修臺灣縣志》，《臺灣史料集成 ·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第 10 冊，卷 3，〈建置志〉，「城池」，頁 169。
2. 依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說法，康熙帝表示「臺灣斷不可建城。去年朱一貴無險可憑，故大兵入鹿耳門，登岸奮擊，彼即竄逃。設嬰城自固，豈能剋期奏捷？」見（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 1736 年魯曾煜序刊本影印），卷 1，〈赤崁筆談〉，「城堡」，頁 49-50。而從藍鼎元〈復制軍論築城書〉、〈與制軍再論築城書〉、〈覆制軍臺疆經理書〉等文可知，他仍持續與閩浙總督覺羅滿保討論建城之事，見（清）藍鼎元，《東征集》，收入《臺灣文獻叢刊 · 第 1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卷 3，頁 27-30、38-39。
3.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說法是：「雍正元年，知縣周鍾瑄創建木柵。」由於雍正元年工程尚未啓動，這或許只是計畫開始起步的線索，見（清）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入《臺灣史料集成 ·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第 6 冊，卷 5，「城池」，頁 152。之後，丁士一在 1724 年 7 月、9 月及 1725 年 1 月至少參與了 3 次建城討論會議，見（清）丁士一，《此遊計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726 年序刊本，善本書號 00739），卷下，頁 4 上、13 上、39 下。
4. 依據一位臺灣守備隊士兵在臺南的見聞，1904 年 1 月 4 日大西門封閉，禁止通行；至同月 25 日重新開放通行，兩邊尚有土堆在收拾。見松添節也翻譯編注，《駐臺南日本兵一九〇四年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頁 8、37。
5. 不著撰人，〈城門折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7 月 11 日），3 版；不著撰人，〈臺南と城門保存〉，《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8 月 25 日），1 版。
6.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編，《史蹟調查報告第二輯》（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36），頁 35-36。
7. 蘇峯楠，〈整座城市就是博物館：臺南博物館巡禮〉，收入李佳卉主編，《臺南歷史地圖散步》（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9），頁 82-85。
8. 不著撰人，《臺灣歷史館出品目錄》（出版地不詳，1935），頁 87。
9. 不著撰人，《臺灣歷史館出品目錄》，頁 91-93。
10. 不著撰人，《臺灣歷史館出品目錄》，頁 88、99。除了城瓦外，谷田幸三另有提供林爾招木製對聯供歷史館展示，見不著撰人，《臺灣歷史館出品目錄》，頁 104。而谷田幸三也曾為文記述清治時期臺南官署相關概況，見氏著，〈州下に於ける領臺前の行政機構〉，《親民》，3 卷 2 期（1938.3），頁 61-66。其他事蹟參見孫祖基，〈被湮沒的臺南碑林〉，《臺灣風物》，6 卷 2 期（1956.2），頁 5-9；江家錦，〈臺南先史遺物的考察〉，《臺南文化》，1 卷 1 期（1951.10），頁 3。
11. 春山行夫，〈臺灣所見〉，《民俗臺灣》，1 卷 4 期（1941.10），頁 11。
12. 楊雲萍，〈博覽會文獻館舉要（續）〉，《公論報》（1948 年 11 月 8 日），6 版。
13. 黃典權編輯，〈歷史館專號〉，《臺南文化》，4 卷 4 期（1955.6），頁 90。
14. 這裡提到的臺博館陳列品清冊，承蒙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助理研究員張安琪教授百忙中接受作者請益並提供資料，補足一段失落環節（missing link），在此謹致謝忱。
15. 這段過程整理自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臺灣省臺南市仁和門古蹟可否拆除」案（檔號 0059/122/1/0001）所收錄相關文件。
16. 王宇清，〈國家文化遺產的保存與維護〉，《東方雜誌》，復刊 6 卷 9 期（1973.3），頁 31。
17. 王政中，〈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與臺灣史研究〉，《成大校刊》，277 期（2022.12），頁 42-43。
18. 王政中，〈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與臺灣史研究〉，頁 45；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史蹟研究室，〈國立歷史博物館與成大歷史學系簽訂研究合約〉，《史蹟勘考》，2 期（1974.6），頁 81-82。
19.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114。
20. 吳成偉，《鹿港龍山寺》（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4），頁 95。